

CHINA BOOK REVIEW

中国书评

第五辑

邓正来 主编

张曙光：天下理论和世界制度

于春松：天下，全球化时代的托古改制

张 法：在反思学术制度时注重对关键词的设定

翟振明：从学术打假到学术打靶

徐新建：“我们”反对“我们”？

沈 阳：性的欲望与宪法权利：

对消极自由的一种自由主义检视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CHINA BOOK REVIEW

中国书评

第五辑

邓正来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书评. 第5辑/邓正来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08-06489-X

I. 中... II. 邓... III. 书评—中国—丛刊
IV. G23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9987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台令娟

装帧设计 王小阳



世纪文景

中国书评 (第五辑)

邓正来 主编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制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 × 1020 毫米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42,000

版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489-X/C·240

定价 20.00 元

中国书评

CHINA BOOK REVIEW

主 编：邓正来

学术委员会：邓正来 吴敬琏 江 平 王 焱 汪 晖
周国平 陈嘉映 张文显 孙立平 许纪霖
季卫东 陈平原 童世骏 夏晓虹 万俊人
何光沪 冯 象 石元康 邓晓芒 徐友渔
雷 颐 葛兆光 郑也夫 张维迎 徐显明
秦亚青 孙周兴 方流芳 秦 晖 陈弘毅
何怀宏 宋新宁 张小劲 徐 勇 赵汀阳
钱乘旦 陈 来 陈维纲 阎步克 王胜今
孙 麾 张 静 景跃进 程 农 郑 戈
赵晓力 姚建宗

学 术 编 辑：4W小组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

目录

从“知识规划时代”中解放出来

——《中国书评》（第五辑）代序 / 邓正来 1

主题书评：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天下体系》的两条方法论原则 / 周 濂 5

天下理论和世界制度

——就《天下体系》问学于赵汀阳先生 / 张曙光 18

天下，全球化时代的托古改制 / 干春松 31

天下观的冒险：徘徊在“中国”与“世界”之间 / 王 峰 41

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五）

在反思学术制度时注重对关键词的设定 / 张 法 50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质量评判问题 / 时殷弘 54

知识生产与学术自由 / 韦 森 57

从学术打假到学术打靶 / 翟振明 60

学术书评

“我们”反对“我们”？

——评说亨廷顿的“新国族主义” / 徐新建 65

庄子的“梦”

——评爱莲心的《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 / 陈壁生 74

全球化和帝国的幻想

——《帝国》：享誉过高的“当代《共产党宣言》” / 陈志刚 86

文学研究：另一种可能风景

——以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为中心 / 刘涵之 99

感受教育学学术那酣畅的魅力

——《什么是教育》读后 / 余小茅 106

两部《近代汉语词典》的比较

——兼论近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 徐时仪 114

学术批评

性的欲望与宪法权利：对消极自由的一种自由主义检视

——评甘阳“与友人论美国宪政书” / 沈阳 125

特别专栏

乌托邦工程何以崩溃

——评詹姆斯·C. 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 / 黄岩 137

极权已逝，乌托邦犹在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评介 / 吕鹏 145

中文简评

主权·分权·法治

——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管华 152

谣言是一种意识形态

——读诺伊鲍尔《谣言女神》 / 刘绪义 158

伊格尔斯与20世纪的西方历史学

——读伊格尔斯著《欧洲史学新方向》与《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 张勇安 164

承认分歧是解决分歧的第一步吗？ / 储昭根 170

我们需要一种怎样的历史理解：从自然法思想切入

——读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 / 崔灿 175

政治学的尊严 / 陈潭 179

西文简评

圣人、武士和预言家

——韦斯特及其《读本》/ 陈怀宇 183

改造教育：改造我们的社会

——读杜威《民主和教育》/ 赵波 194

《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的论述》/ 刘立灿 200

序跋随笔

走出“明希豪森困境”

——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述评 / 舒国滢 205

有关“宪法是什么”的迷思 / 王人博 226

学者荐书 / 231

《中国书评》稿约 / 233

从“知识规划时代”中解放出来

——《中国书评》（第五辑）代序

邓正来*

中国社会科学要发展，就必须以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为前提。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大力发展的当下，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而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可以从下述两个角度予以认识和理解：一是学术规范的角度；二是知识生产活动与知识生产机器之关系的角度。

一、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学术自主性

首先，我们必须把学术研究的场域与经济活动的场域、政治活动的场域和日常生活的场域严格区别开来。我们现在的学术场域所遵循的是什么原则或何种逻辑呢？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将当下的学术场域与经济活动场域做一番比较，便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已然所剩无几了。（1）我们评价学术水平的标准主要是字数多少的标准，其结果就是数量上去了，质量下降了，而且抄袭剽窃、搞关系出版低质作品、用学术研究项目经费出版低质书籍等现象也比比皆是；更为重要的是，出版作品赖以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机制也被扭曲了；这种做法与经济场域中一些人以假冒伪劣产品追求效益最大化又有多少区别呢？（2）现在经济活动场域中盛行会展经济，而我们的学术场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学术界的会议可以说一个接一个，有的学者甚至一天要参加几个会议；结果，出场率取代了会议的质量以及与会者发言的质量而成为人们的关注重点。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形中，我们究竟还有多少时间去阅读和思考呢？（3）现在的经济活动场域中流行品牌代言人，我们的学术界也把哈贝马斯、德沃金这类大师级的人物请来做代言人。作为学术交流，这原本无可厚非，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有的大学居然请德沃金先生去作“认真对待权利”的演讲，而这使得德沃金本人都感到非常不解，因为这本著作已经出版三十多年了。

* 邓正来：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中国书评》主编。

于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我们请来这些大师级的人物,究竟是我们可以在日后有更多的关系性“谈资”呢,还是我们真正对他们学术的关注或真正对学术交流的关注呢?据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不捍卫我们学术场域的自主性,我们就会丢失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资本;如果我们丢失了这种社会科学资本,我们就不能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而也就丧失了我们所宣称的学术和学者的防特性。因此,我们必须捍卫学术研究场域的自主性。

其次,我们必须捍卫学术研究评价标准的自主性。这意味着,(1)我们必须把学术研究本身的重要性与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严格区别开来。的确,中国经济发展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对这个重要问题进行的研究也因此而重要了;与此同理,爪哇岛村落的习惯也许无甚重要可言,但是这同样不等于说所有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因此而不重要。(2)我们必须把学术研究本身的重要性与学者相关的研究机构的重要性严格区别开来。牛津大学很重要,哈佛大学很重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一个访学过这些大学或毕业于这些大学的人士所做的每项学术研究也都当然重要。北京大学很重要,吉林大学很重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其间工作的人士所做的每项学术研究也都当然重要。(3)我们必须把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与学术研究者的身份严格区别开来。这意味着,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无论是校长还是一般教员,在知识面前都是平等的,尤其在关乎这些人的个人学术研究的评价方面,就更是如此了。

显然,从学术研究自身的角度看,只有当我们不再把我们研究对象的重要性误作是我们研究的重要性的时候,只有当我们不再“乐观地”把外部环境的进步误作是中国社会科学自身的进步的时候,只有当我们不再把任何身份或机构因素和任何即时性的外部需求误作是评价社会科学研究判准体系的时候,只有当我们不再简单地把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的担当误作是我们毫无批判地把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等而视之的理据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才有可能不会在与其他场域发生互动关系的过程中沦入一种“不思的”依附状况之中,我们的学术研究才有可能建构起其自身的自主性和批判性。

二、从知识生产活动与知识生产机器间的关系来认识和理解学术自主性

毋庸置疑,上文的讨论只是建构或捍卫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一个方面。就此,我们还必须强调,我们不仅必须关注知识研究本身的问题,而且还必须对中国既有

的“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因为在我看来，虽说中国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都处在转型的过程之中，但是我们对中国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所具有的那种“集体性”和“宰制性”却仍处于不意识的状态之中。

我认为，在中国发展的今天，个人的知识活动既不是一种纯粹的“智性活动”，也不是西方当代社会中的那种高度制度化的“个人性”社会实践活动，而毋宁是一种“集体性”和“宰制性”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所谓“集体性”和“宰制性”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亦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在当下深陷于其间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时代。这种“知识规划时代”所具有的最为根本的特征，乃在于它是以政治性的权力和由它确定的“学术”制度安排为基础的，而这意味着这种政治性的权力和“学术”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不仅确定了我们的知识生产方式，而且还构成了我们知识产品的具体内容。

在这样一个“知识规划时代”，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主要存在着两大知识生产趋势以及与其相应的两大“知识类型”——尽管边缘化的个人性知识生产方式在任何时候都始终存在着。第一，存在着一种并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某种“自上而下”的规划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由于这种规划本身是从意识形态、政策或非学术的需要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把那种根据它而生产出来的知识称之为“规划的知识”。第二，存在着一种也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其他各种需要（比如说社会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亦即违背知识场域逻辑的那种知识。

显而易见，这两类知识并不是个人性知识活动的结果，而是知识分子或者根据某种特定的“知识规划”或者以经济、社会及政治等场域的逻辑为原则而由某种特定的“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据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在个人性知识生产方式以外，还存在着一种“集体性”的知识生产方式及其赖以凭的“知识生产机器”。再者，无论是“知识规划”，还是“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都是以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并与之“合谋”为前提条件的。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这两类假、大、空的知识，不仅会遮蔽中国当下所存在的真正的现实问题，甚至还会扭曲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宰制我们思想的方式和思考的维度。

在这个“知识规划的时代”，最令我们担忧的是这样三种现象：第一，我们在使自己沦为这个知识时代的“合谋者”的时候却对此毫不意识；第二，我们乃是在脱

离对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的情况下对知识展开批判的，而这会使我们无法有效地洞见到中国当下的知识生产过程以及这种知识的性质；第三，由于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性质的不认识，所以我们还会通过我们自己的各种“改革努力”而把这台知识生产机器粉饰得更加美丽，使其在生产和再生产规划的知识的时候更有效，进而使其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那种知识具有更大的正当性。

据此，我认为，对于处于危机之中然却欲求发展的中国社会科学或者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而言，也是在这样一个我称之为“知识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当下使命就在于：一方面必须对我们这个“知识规划”的时代以及其间的知识类型进行全面的讨论和批判；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便是必须对这种为知识生产机器所支配的知识类型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和反思，而不是只进行常规意义上的重思，因为只有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之中，我们才有可能揭示出和意识到我们原本不意识的隐含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之中的各种社会条件或权力关系，进而把我们从这个“知识规划时代”中解放出来。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赵汀阳 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天下体系》的两条方法论原则

周 濂*

关于赵汀阳在中国哲学界的定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河有一个有趣的评价：“trouble maker”（麻烦制造者）。如果嫌这个词不够顺耳，李河还有一个更为中性的评语：“problem maker”（问题制造者）。从早年的《论可能生活》、《人之常情》，直到最近的《天下体系》以及《第一哲学的理由和困难》，尽管论域从伦理学、政治哲学再到形而上学一转再转，不变的是赵汀阳式的“鲑鱼”效应。这种天生在想法上和说法上的不安分守己，必然招致爱憎分明的两种极端评价：推崇者欣赏他的问题意识以及天马行空的创造性，反对者则对他“过多地关注‘语言的力度’而忽略了‘思想的力度’”^{〔1〕}愤恨不已。不过至少有一点推崇者与反对者是一致的，那就是在读毕赵汀阳的著作后，甚少有人能够一笑置之，他一定会在某些地方刺激到你辩论的神经，让你忍不住要好好和他“理论”一番。

通常说来，“理论”理论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外在的批评，一种是内在的批评。鉴于人们总是热衷于谈论彼此（talk about each other），而不是耐下性子彼此谈论（talk to each other），所以外在批评成为当前学术批评的主宰方式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奇。

《天下体系》同样难逃这样的命运，毫不夸张地说，自问世以来此书就一直处在

* 周濂：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师。

〔1〕 倪梁康：“再次被误解的 transcendental——赵汀阳的‘先验论证’读后记”，《世界哲学》2005 年第 5 期，第 106 页。

外在批评的漩涡之中。在各种学术讨论会或者书评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些批评意见:政治现实主义者认为在中国的国家利益尚未得到保证、民族—国家的建立仍处于现在进行时之际,如此胸怀宇宙、奢谈“世界制度”是失之于高远的;犬儒主义者则担心“天下”概念可能蕴含“华夏帝国主义”的逻辑后果和野心,不仅违背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韬光养晦策略,而且还会招致国际势力的不安乃至反弹;而在一些信而好古的国学家眼里,《天下体系》过于偏重哲学义理的阐发,疏于文献的考据,在资料整理和概念梳理上不够厚实。我承认上述观点或多或少有些道理,但却仍旧属于外在批评的范畴。关于外在批评,一个最为鲜明的指认特征就是它们总是轻而易举同时也是似是而非的。原因无他,因为外在批评者既缺乏对作者基本思路的同情了解,也没有深入到理论内核进行发问,其结果必然只是停留在批评者一己立场的伸张上,缺少对问题实质推进的诚意及贡献。相反,内在的批评则要求批评者怀抱同情的理解,尽可能按照理论的内在逻辑去推演和检视它的限度与可能。惟其如此,才具有学术批评天然要求的建设性和批判性,因为它在直面理论内部问题的同时尽量保持问与答的开放性,而不是因为立场相左就进行简单的否定或拒斥。

《天下体系》的副标题是“世界制度哲学导论”,问题缘起于这样一个观察:“我们所谓的‘世界’现在还是一个非世界(non-world)。”“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真正严重问题并不是在世界中存在着所谓的‘无效国家’(failed states),而是一个‘无效世界’(failed world)。”〔2〕这个观察精准且深刻。迄今为止的各种国际秩序理论,无论是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策略,康德式的自由主义方案,还是格老秀斯式的国际法传统,都没能让世界成功摆脱“自然状态”或者“无政府状态”。而现实的情况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无所不包的席卷态势,所有地方性的问题都日益成为世界性的问题,所以尽管世界制度在现实性上仍旧遥远,可它又不折不扣是世界的迫切需要。赵汀阳认为,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不仅无法应对无效世界的尴尬窘境,而且根本就是始作俑者,反观来自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中的“天下模式”,却恰好由于它在“世界理

〔2〕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412页。以下引自本书的文字均直接在文后标明页码,不再另加注脚,此外引文中凡出现黑体字均为本文作者所加。

念和世界制度的基本原则具有哲学和伦理学优势”，能够成为一个更具生命力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具体地说，像“先验一体性观念、他者哲学以及和谐理论”都为解决“无效世界”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资源。（第105—106页）

这是一本无论立意或者行文都让人非常有阅读快感的专业著作。赵汀阳一如既往地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哲学命题。限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介绍并回应之。总体而言，我认为这本书在理论上的贡献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中国哲学论述风格和内容的突破，二是对传统西方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挑战。

关于前者，可以一言以蔽之地称之为“让哲学说中国话”。^{〔3〕}如何让中国哲学成为世界哲学的一部分，并且这“一部分”不是供西方人猎奇赏玩的对象而是切实拥有解释权和发言权的“活话语”，是赵汀阳长久以来孜孜以求的一个核心主题。按照赵汀阳的观点，只有当中国的学术概念成为解释的概念而不是被解释的概念，成为思想的根据而不是被思考的材料，中国思想才真正成为有生命力和主导性的话语资源；也只有当哲学开始说“中国话”的时候，哲学才可能被不同地表述，世界才可能被不同地表述。《天下体系》正是在上述思路的指引下展开实质性的哲学操练，试图在“世界制度”问题上激活“天下”、“礼不往教”、“无外”等中国传统概念，对时代问题做出积极的思考和回应。此种运思方式毫无疑问是对传统国学的一大突破，我相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天下体系》都是关心中国哲学命运的人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文本，因为它向中国学者展示了何谓“中国现在的思想任务和必然逻辑”。

论及此书对政治哲学的贡献，尽管“天下模式”作为一个替换方案为解决“无效世界”提供了一条极富创意的思路，但是相比之下，我更关注赵汀阳在论证“天下模式”时所依赖的两条方法论原则。事实上赵汀阳本人也相当看重他在方法论上的突破和创新。他不但反对那种抢占道德高地、停留在简单枚举层面的中西文化优劣比较，而且明确指出中西哲学真正重要的差异是“理解政治制度的方法论上的差异”。更进一步地说，“如果说中国的政治哲学具有优势的话，它只是方法论上的纯粹理论优势，而与道德水平无关。”（第23页）很显然，面对这样一个自信且极富挑衅性的论断，任何人都会不由得继续追问，西方政治哲学方法论到底出了哪些问题？以及，（赵汀阳眼中的）中国政治哲学方法论的优势又体现在哪里？

〔3〕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讨论参见拙文“让哲学说中国话”，《中华读书报》2004年5月。

在我看来,贯穿《天下体系》全书并且标示出中国政治哲学方法论之“纯粹理论优势”的两条原则分别是“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 holism)以及“政治制度的一致性和传递性原则”。所谓“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并不是赵汀阳本人的术语,而是我对他的一个总结,以此对应于西方政治哲学主流中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和“以部分支配整体”的分析路径。至于“政治制度的一致性和传递性原则”,按赵汀阳的定义则是:“任意给定一种政治制度,……假如它要具有理论上的一致性从而经得起理论质疑的话,那么它必须能够在任何政治层次上被普遍化,也就是说能够被普遍地贯彻应用于所有的政治单位,并且,在给定的政治系统中的各个层次之间具有传递性。否则,它就是理论上不完备的。”(第141页)由于这两条方法论原则是全书立论的根据所在,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检讨这两条方法论原则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就远比直接探讨本书立论更具有哲学意义,同时也更有助于我们探究“天下体系”的理论可能及其限度。

让我们先来分析第一条原则,即“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原则。

按照阿兰·尼尔森(Alan Nelson)的观点,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要去证成国家(justify the state),其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论证策略是这样的:“第一步……从一些道德和个人的原则出发。……第二步表明一个国家如何将会或者如何能够充分地遵循这些个体性道德原则而发展起来。第三步是表明一个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或者将会发展起来的、或者能够发展起来的国家,能如何促进道德上可欲的个体行动。”〔4〕

上述策略可以被概括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其要义是所有关于社会国家现象的解释都必须完全根据个体的事实来加以表达,否则就将遭到否定或拒斥。〔5〕尽管普遍认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要迟至霍布斯的《利维坦》才得到第一次清晰的

〔4〕 Alan Nelson, “Explanation and Justification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Ethics*, Vol. 97, No.1, (Oct.1986), p. 155.

〔5〕 Steven Luke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in Derek Matravers and Jonathan Pike (eds.), *Debates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Routledge, 2003, p.12. 查尔斯·泰勒在“Cross - Purposes: The Liberal - Communitarian Debate”一文中指出,在关于在解释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哪种因素是解释顺序中的最终因素存在两派对立的观点,一个是原子主义者,一个是整体主义者。前者又被称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普遍相信:第一,在解释的顺序上,能够而且应该根据个体组成因素的属性去解释社会行动、结构以及条件。第二,在慎思的顺序上,能够而且应该根据个体善的一系列关系去解释社会善。参见 Charles Taylor,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81 - 204.

表述，并在洛克以降的社会契约论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中得到延续，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就会发现这类论证模式甚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氏的基本工作方式是这样的：首先提出一个有关人性的论点，这个人性观包括对人的基本需求和能力的解释，基于这个人性论的基础，再提出一套人类幸福的主张，也就是阐述在何种条件下，有助于具有这样特点之人类实现其愿望，然后再依据这个论点，确立何种制度最能实现这些促进人类幸福的条件。^{〔6〕}

由此可见，西方主流的政治哲学论证模式尤其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至少包含以下两个基本要素：（1）在解释顺序上，坚持把个体作为解释社会和国家的原初起点及最终根据；（2）在哲学人类学上，对人性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或判断，比如说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或者社会契约论中对“人天生是自私（自向，自利或者个人主义）”的设定。

赵汀阳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多有不满，但是这并非他个人的思想专利，事实上早在19世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就已经在西方频繁遭遇各方狙击。比如说在法国，从神权主义传统（the theocrats）、圣西门（Saint-Simon）、孔德（Comte）直至涂尔干（Durkheim），理论基础都是建立在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否定之上；在德国，反对之声同样遍及社会科学诸领域，如历史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以及哲学，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学派都是其中的佼佼者。^{〔7〕}上述反对方案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认为在解释顺序和论证逻辑上整体要优先于部分，国家（社会）要优先于个体，所以被统称为“方法论的整体主义”。既然“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在西学传统中源远流长，那么赵汀阳式的“整体主义”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与之有所区别？

如前所述，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无论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其目的都是为了“证成国家”或者“解释社会生活”，换言之，它们的问题领域始终限定在民族—国家内部，在理论设计之初就没有将世界问题容纳在视野里，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现有的任何国际理论都是“虚假的存在”，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只

〔6〕 J. Donald Moon, *Constructing Community: Moral Pluralism and Tragic Conflic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转引自林火旺,《多元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网络资源。

〔7〕 Steven Luke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pp. 12-13.